

“欧洲政党及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会议综述

门 镜

2025年5月30日至3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办、上海欧洲学会协办、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项目”部分资助的国际会议“欧洲政党及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在华东师范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新疆大学的中国学者以及来自欧盟机构及基金会智库、欧洲知名大学的专家,共同探讨在地缘政治动荡背景下,政党政治如何塑造欧盟的集体选择。大会设置了一个主题演讲和七个小组发言,围绕“制度演变与欧盟党派政治的战略影响”“民粹主义、激进右翼与欧盟民主治理的冲突”“政党政治与欧盟对华战略”“战略竞争、东扩与欧盟对外政策”四大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与会者重新审视了欧洲政党如何在地缘政治动荡、民主倒退和全球规范竞争背景下影响欧盟决策,强调欧洲政党并不是被动回应危机的行为体,而是在重塑欧盟治理、重新配置制度联盟以及重新定义对外战略中发挥了积极主动

的作用。会议主要发言总结如下。

一 开幕式与主旨发言

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冯绍雷在致辞中指出,当今欧洲面临多重挑战,民粹主义上升、传统政党体系重组、新保守力量兴起以及气候变化、经济动荡与全球性疫情等带来严重冲击。新的变化促使我们反思欧洲政党在多层治理体系中如何影响政策制定?这些机制如何塑造欧洲一体化的韧性?他期待会议的研讨能揭示欧洲政党如何在复杂的多层治理体系中发挥政策影响,并探讨欧洲经验对民主、制度韧性与一体化的启示;并鼓励与会者把握面对面的交流机会,会议不仅是研究欧洲政治的场域,也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教授在发言中强调,近年来,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包括传统政党体系的重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保守政治力量的重新配置。与此同时,欧盟也面临疫情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气候政策演变,以及全球治理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欧洲政党集团如何影响欧盟决策,不仅恰逢其时,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莫内曾说过:“我们并不是在组建国家联

盟,而是在团结人民。”本次会议超越了国界、世代与学科的界限,为与会者带来严谨深入的讨论,缔结持久的学术合作关系,并推动我们对知识的共同追求。

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丁纯教授认为,本次会议聚焦欧洲政党体系演变对欧盟决策机制的深远影响,在当前全球秩序剧烈变动、地缘政治紧张和治理规范承压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欧洲正面临三大关键趋势:一是民粹主义崛起与右翼势力借助社交媒体挑战主流政治架构;二是因北约可信度下降而引发的欧盟安全架构重构,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与防务整合;三是在美欧贸易与科技摩擦加剧下,欧盟重塑经济治理体系,通过碳关税、数字市场法案和反胁迫工具强化外部抗压能力。在此基础上,中欧关系虽仍有结构性分歧,但已呈现战略回暖与高层互动复苏,数字治理与基础设施合作作为双方提供制度化对接的新机遇。此次会议承担了解政党变化、预测制度韧性风险与推动中欧共治理念融合的三重使命,旨在为全球治理探索创新路径。

在主旨发言环节,布鲁塞尔马滕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克劳斯·维勒(Klaus Welle)指出,不能孤立地理解欧洲政党,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制度结构和空间格局中加以考察。欧洲联盟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但也远非一般的国际组织,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政治实体”,其治理实践已经深入立法、政策制定和社会秩序的诸多层面。欧盟的复杂性不仅源于其成员国的差异性,还体现在制度纵横交错的治理架构上。国家政党与欧盟层级政党的互动构

成一个典型的“多层治理体系”,政党必须在国家与超国家之间不断协调、妥协和博弈。他回顾了 1979 年欧洲议会实现首次直选以来,政党党团逐步制度化的发展路径。从最初的松散联盟,到今日的欧洲人民党党团、社会民主进步联盟党团、复兴欧洲党团、绿党党团、保守与改革者党团及欧洲爱国者党团,这些政党党团已成为议会运作的基本单元。然而,这些欧洲政党长期面临“弱制度化”困境:缺乏基层组织与群众动员能力;欧洲选举仍以国家议题为主,媒体与公众关注度有限;各国成员党之间意识形态差异显著。尽管如此,政党集团在议会中依然扮演关键角色,包括协调立场、参与跨机构谈判等。维勒还认为,欧盟政治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反对派”二元结构。由于欧盟并无统一的政府,政党之间也很难形成稳定的多数与反对关系。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多数联盟因案而异,权责对应不清,民主问责机制薄弱,因此,应将欧洲政治理解为一种“协商型民主”,其中政党间的合作能力远比意识形态对抗更为关键。而右翼政党可以被区分为“建设性的右翼”与“破坏性的右翼”:建设性右翼如部分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保守与改革者党团成员,虽对欧盟持批评态度,但愿意参与谈判、推动立法、尊重程序;破坏性右翼,如欧洲爱国者党团成员,则否认欧盟制度的正当性,常采用抵制投票、程序拖延等手段。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为何部分右翼政党能参与议会中政党多数联盟,而另一些则被排斥在外。当今,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极大地改变了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它们拓宽了接触面,增强了政治动员,但也加剧了信息碎片

化与极端言论的扩散。因此,欧洲政党不仅要学会“数字化竞选”,更要在算法主导的舆论环境中重建“公共理性”,维护多元而有序的政治讨论空间。最后,维勒强调欧盟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条约与机构,更取决于那些赋予其活力的政治行为体。政党既是制度的产物,更是制度变革的推动者。它们承担着将民意引入欧盟治理体系的桥梁角色,也是确保欧洲民主正当性与可持续性的中坚力量。主旨发言之后,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奥利维耶·科斯塔(Olivier Costa)、“让·莫内终身讲席教授”宋新宁和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张亚宁作为评论嘉宾,与维勒就政党对欧盟机制的影响、主流党团协作困境与制度韧性展开热烈讨论。

二 制度演变与欧盟党派政治的战略影响

在这一主题发言中,与会者们聚焦欧洲政治党派在欧盟多层治理结构中的制度性作用与联盟策略的演变进行深入研讨。几位发言人分别从党派协调机制、政党外交工具、右翼民粹主义主流化,以及极右翼跨国合作的现实局限四个角度,揭示了欧洲政党如何通过制度化路径与意识形态传播,深刻影响欧盟治理逻辑;欧盟党派政治不仅是代议与动员机制,更是制度形塑与政治博弈的关键力量。

鲁汶大学的范·赫克(Van Hecke)教授回顾了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间隙的党派政治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他指出,从21世纪初期由欧洲人民党党团推动的非正式首脑预会谈机制开始,党派协调逐步演变为制度化、程序化的高

层共识形成平台。这些会议不再是党团内部的简单会晤,而是逐渐成为实质性政策预协调的重要场域。该机制不仅提高了议程管理的效率,也提升了执政联盟在欧洲理事会中的话语权。这项实证研究展示了政党政治如何通过制度嵌入改变高层政策制定逻辑,为理解欧洲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巴黎政治学院的奥利维耶·科斯塔教授探讨了欧洲议会中极右翼政党日益“正常化”的现象及其制度与规范影响。他通过对议会内部政党结盟行为的实证分析,指出中右翼力量(尤其是欧洲人民党党团)在各议会委员会投票与领导职务上,与极右翼政党存在越来越多的合作迹象。这种合作不仅仅是策略性的临时行为,更反映出在移民、安全、主权等议题上的意识形态趋同。科斯塔教授认为,此种合作可能瓦解长期以来主流亲欧派之间维持的非正式共识,从而为疑欧与反自由主义话语提供制度空间。这种趋势可能导致“规范滑坡”,即欧洲议会逐步丧失其作为民主与法治守护者的象征角色。这一研究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联盟重组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深度警示。

复旦大学的张亚宁和杨昭探讨了欧盟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PRRPs)是否正在成为具有变革性的政治力量。他们通过对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右翼政党的竞选纲领进行定性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普遍将欧洲一体化、移民、环境与气候、经济政策等作为最核心的优先议题。其中,在欧洲一体化、移民与环境领域,各党之间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往往主张削弱欧盟干预、恢复成员国主权,但在贸

易、防务与财政政策等领域,不同政党之间立场分歧较大,呈现出立场碎片化的趋势。尽管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正在部分政策领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施加实质性影响,但由于内部缺乏共识,在更广泛层面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破坏性力量”,难以颠覆欧盟的基本制度框架。

圣彼得堡欧洲大学历史系林圣寅和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杨莹泽分析了欧洲议会七个主要党团在2019—2024年间对欧盟可持续发展立法的立场、投票行为及其背后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动因,指出这些党团在总体目标上虽有共识,但在路径与优先事项上存在显著分歧。经研究发现,中右翼党团倾向务实平衡环保与竞争力,中左翼党团强调社会公正与气候雄心,右翼党团主张国家主权与渐进转型,而左翼党团则批判市场化路径,倡导结构性变革。他们认为,这些差异不仅源于意识形态,还受到欧洲一体化观念、成员国利益结构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共同影响。

爱丁堡大学的乌奈·戈麦斯-埃尔南德斯(Unai Gómez-Hernández)博士探讨了欧洲议会党团所属政党基金会的研究如何影响欧洲议会在对华关系上的决策过程。尽管以往关于欧盟对外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欧盟委员会或理事会等正式机构,但值得关注的是政党机构在塑造意识形态一致、战略理性并具可预测性的议会立场方面发挥着关键但被忽视的作用。经研究发现,欧洲人民党党团与复兴欧洲党团对中欧关系高度关注,常将中国描绘为“制度性对手”,尤其在贸易与地缘政治议题上。社会民主进步联盟党团的立场模糊或保持沉默,而绿

党和保守与改革者党团在对华议题中较为边缘化。

三 民粹主义、激进右翼与欧盟民主治理的冲突

围绕这一主题的发言讨论了民粹主义与激进右翼如何系统性削弱欧盟的民主规范与制度稳定性。尽管这些政党在选举层面的表现不一,但其在话语建构与制度运作中的干预已不容忽视。多位发言人围绕德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匈牙利与波兰的案例进行分析,展示了国家层面的民粹主义发展如何在欧盟层面产生回响。这些政党不仅挑战了自由主义共识,还借助制度模糊性、身份政治与外部危机,逐步在欧洲制度体系中嵌入非自由主义影响。

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威廉·霍夫迈斯特(Wilhelm Hofmeister)博士对德国选择党(AfD)与奥地利自由党(FPÖ)进行了纵向比较分析,二者均是近年来在选举与舆论上快速崛起的激进右翼政党。他回顾了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演化轨迹,指出它们从边缘化的民族主义反对派逐渐发展为系统性的反自由、身份政治叙事推动者。霍夫迈斯特博士强调,这些政党的崛起显著加剧了欧盟党派体系的极化,尤其体现在移民、主权与一体化议题上。它们不仅改变了议会中的话语结构,也迫使中右翼政党采取更趋保守与排外的政策立场。即便在欧洲议会中席位不多,这些政党依然通过话语主导与议程设置,对欧盟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对称性影响。

荷兰蒂尔堡大学的扬·雅普·德·鲁伊特

(Jan Jaap de Ruiter)教授分析了荷兰民粹政党,尤其是自由党(PVV)与新兴的农民党(BBB)的发展轨迹。他指出,这些政党通过文明叙事强调文化优越性、对伊斯兰的恐惧以及使用反精英话语进行政治动员与规范挑战。这种话语不仅面向国内选民,也被嵌入荷兰参与欧洲辩论的方式。以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为首的自由党长期倡导排外民族主义,并以基督教一世俗价值对抗伊斯兰文化。尽管农民党主要关注农业议题,但其民粹论调亦对欧盟的环境治理与监管权威提出挑战。鲁伊特教授的研究贡献在于阐明“文明话语”如何成为跨国政治词汇,进而重构欧盟政策制定的规范语境,使边缘政党获得更大影响力。

重庆大学的钟准副教授与外交学院的魏康婷聚焦于民粹政治如何外化为国家外交行为。他们以匈牙利和意大利为案例,分析两国政府如何根据国内联盟结构与制度逻辑,选择性地破坏欧盟政策的一致性。匈牙利在欧尔班领导下已成为“系统性挑战者”,屡次否决欧盟共同立场、削弱外交共识,并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建立良好关系。相较之下,意大利外交则更具摇摆性,在对外策略上表现为“冲突—合作”的交替。其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建立了国内民粹政治结构与欧盟外交运作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了欧盟制度(如一致性投票规则)如何被非自由主义行为者利用以服务本国政治的正当性。

复旦大学的李炳萱探讨了在外生危机背景下,欧盟对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和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民主倒退”行为的监管态度为何在加强与放松之间反复摇摆。

其监管立场主要体现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是会冻结或解冻资金。她指出,危机情境、制度机会、成员国否决权、功能性需求、监管工具成熟度五个变量共同决定了欧盟的监管力度。而且,外部危机不仅是并行议题,更成为影响欧盟治理逻辑的宏观背景。在危机环境下,法治正被工具化,成为政治博弈中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引发欧盟合法性的新困境。其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欧盟在维护自身价值体系时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当法治因地缘政治妥协而失去连贯性时,其制度权威与规范基础也遭受侵蚀。

四 政党政治与欧盟对华战略

围绕这个专题的发言重点关注政党政治与欧盟对华战略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与以往仅从制度或战略层面出发的分析不同,这一主题聚焦于意识形态多元性、国内党派动态以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博弈如何影响欧盟对中国的认知与政策回应。中国问题已不再是技术层面或纯外部议题,而是欧洲内部高度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争议焦点。欧盟对华战略并非在理性一致的技术官僚体系中制定,而是在党派竞争、制度摩擦、意识形态遗产与议会互动中逐步生成。这也意味着,欧盟对华政策不仅碎片化,更深受内政结构的影响,呈现出高度不稳定性与政治化特征。这一单元发言的突出特点是,涵盖中欧关系的多层次分析视角,兼顾从上而下的战略态势与自下而上的政党主导性议题重塑。

同济大学的王传兴教授系统比较了法国、

德国和英国“新右翼”(New Right)力量的兴起、发展路径及其对外政策,尤其分析了其对华政策的潜在影响。欧洲新右翼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步从政治边缘走向主流,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后迅速崛起。他从两条路径阐释新右翼力量:一是作为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发展轨迹;二是作为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传统的延续与变革。这些政党反对全球主义、强调文化本位的国家主权、力图建立一种以“出生文化”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这种新右翼思潮正深刻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对外交政策(包括对华立场)的影响,正日益体现在国家认同、文化主权与反全球化逻辑之中。

华侨大学的讲师杨继龙分析了欧洲各类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策略差异及其有限但复杂的影响力。他指出,与普遍认知相反,民粹主义政党并不总是采取亲华立场,实际上它们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常常与主流政党相吻合,尤其在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问题上。以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为例,该党对欧盟“去风险”政策持怀疑态度,反对盲目追随美国的对抗战略,但也支持限制中资参与德国港口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关键设施应由本国控制,这与主流立场并无明显差异,因此,需进一步展开案例研究和策略分类,以准确评估民粹主义实际影响与媒体话语之间的差异。

中国政法大学张飏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嵇先白副教授指出,近年来,欧洲的立法机构在中欧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的个案分析,他们发现,在这些中东欧国家中,议会政党在上台前已表现

出强烈的亲台立场。一旦执政,这些党派迅速采取实质性行动,如允许设立“台湾代表处”、组织议员代表团访台、通过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的议会决议等。相较于外部因素的刺激,这些政党在未执政时就确立的对台政策更具决定性。该模式在中东欧国家中具有代表性,显示了政党意识形态与议会政治对中欧关系演变的重要影响。

复旦大学的荆婧博士分析了欧盟如何看待互联互通平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指出中欧虽都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但在理念、执行方式与战略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欧盟强调“战略自主”与“防御性开放”,而“一带一路”则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她深入分析了欧洲议会四大主流党团对中国的政策立场并指出,欧洲议会内部的跨党团共识在对华政策中具有显著影响,如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推动欧盟数字治理、贸易与气候议程等,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双方的战略协调,缓解党派间的碎片化趋势,并推动中欧与“全球南方”的三方合作,以实现更具建设性的制度互动与互联互通发展。

五 战略竞争、东扩与欧盟对外政策

这一单元的议题聚焦欧盟内部政党政治与其战略与地缘政治角色之间的交汇点。与会者探讨了欧洲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影响欧盟应对全球大国竞争、东扩政策与邻国稳定关系的方式,发言内容涵盖了对外政策、技术主权、扩大机制与规范性外交等争议领域,强调政党政治是欧盟对外关系的关键变量。欧盟的对外

角色已无法与其内部政治秩序相分离。如今,战略竞争与对外政策深受欧盟内部党派与意识形态裂痕的影响。在面对中国崛起、俄乌冲突与全球化重构等挑战时,欧盟需要同步应对内部政党格局对其全球定位的深层塑造。

四川大学涂东副教授探讨了欧美右翼民粹主义的趋同与分歧及其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影响。她指出,欧洲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存在显著共性,包括民族主义、保守传统价值、反多元文化与反移民态度;在政策层面,也都强调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反绿色转型。但在现实利益与政策执行上,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存在明显分歧。虽然欧洲右翼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表示钦佩,但当这些政策损害欧洲出口与产业利益时,也表现出批评态度,说明两者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具体取向上存在冲突。这种民粹主义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欧洲右翼表现出反美倾向,美国右翼亦带有强烈反欧情绪。此外,双方在政治体系中影响力有限、意识形态排他性强、战略利益冲突,导致建立“新型跨大西洋主义”的可能性较低。右翼民粹主义虽源自真实的不满情绪,但其解决方案往往加剧社会分裂、权力集中,若不妥善应对,将长期削弱西方民主的凝聚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忻华研究员探讨了法国、德国、英国与荷兰的极右翼民粹政党如何在多层治理框架下影响并制约欧盟地缘经济战略。他结合精英主义、多元主义与制度主义理论,从政策实践中分析欧盟在战略自主、经济安全与技术主权等方面的治理逻辑。极右翼政党通过欧洲议会、国家议会及基层舆论等渠道施加影

响,强调经济民族主义、批评全球化,主张国家主权优先。欧盟与极右翼政党在地缘经济战略上的立场既有重合也有分歧。尽管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在上升,但其对欧盟战略的总体制约仍有限。这些政党的“国家优先”与“去欧盟化”立场,与欧盟构建集体经济安全与战略自主的整体方向形成结构性张力,也反映出欧洲基层社会对全球化与技术官僚的不满情绪。

斯特拉斯堡政治学院副教授泰奥娜·拉夫雷拉什维利(Teona Lavrelashvili)探讨了欧洲人民党党团如何与非欧盟国家的政党建立联系,并扮演欧盟对外政策中的积极角色。她指出,欧洲人民党党团与外部政党的合作不仅仅出于规范性(价值导向)动机,更受到理性选择(利益导向)的驱动。拉夫雷拉什维利选取了塞尔维亚(欧盟候选国)和格鲁吉亚(研究期内为非候选国)作为比较案例,认为欧洲人民党党团对外合作关系具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特征,候选国政党也在主动塑造欧洲政党的行为。欧洲人民党党团不仅是规范的传播者,更是欧盟扩大政策中的战略行动者。其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跨国政党合作模型,丰富了对欧盟邻国政策与政党政治之间关联的理解。

新疆大学的侯鹏飞副教授探讨了波兰民粹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在2014年至2024年期间如何看待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政党在战略亲欧主义和民族主义、怀疑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这使其在乌克兰入盟过程中“两度摇摆”。相关议会辩论、公开声明和投票记录,都表明法律与公正党对乌克兰的支持与波兰的地缘政治利益包括反俄立场是一致的。

然而,其言论往往与更广泛的欧盟团结相冲突,揭示了地区领导权野心与民族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侯鹏飞引入“选择性欧洲化”的概念,分析波兰民粹主义者为何支持乌克兰的欧盟道路,因为这条道路符合他们对欧洲的愿景——基督教、主权优先、反俄——同时抵制更深层次的一体化逻辑。其研究分析了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利用欧盟扩大话语来塑造国内叙事,但即使支持者声势浩大,若要对乌克兰的欧洲道路达成共识,也是困难重重。

本次会议呈现出的最为深刻的洞见之一,是对欧盟治理主体结构的重新定位:政党不再是欧盟制度运行的附属变量或背景参与者,而是其内部协调与外部拓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结构性塑造者。传统的欧盟研究大多聚焦条约权限及制度设计与机构安排,忽视了在这些制度背后推动议程、整合立场、输出规范的政党力量。研讨会通过一系列涵盖实证研究、比较分析与理论创新的成果展示,指出政党政治正在成为理解欧盟合法性、政策效率与治理韧性的核心分析单元。

在欧洲议会层面,诸多研究显示,政党联盟与意识形态结构直接决定了议会在外交、安全、气候、技术规范等关键领域的政策方向。党团联盟的重构不仅反映了成员国国内政治的碎片化趋势,也揭示了欧盟制度自身面对危机与分歧时的再调整能力。而在对外关系层面,欧盟政党,尤其是主流党团如欧洲人民党党团、社会民主进步联盟以及复兴欧洲党团,正通过与候选国、周边邻国的政党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伙伴关系,推动欧盟价值体系和政策范式的外部

扩展。这些跨国互动机制表明,政党已经在欧盟外交与扩展政策中扮演着“准外交行动者”的角色,其行为逻辑既受规范驱动,也包含策略博弈。

此外,会议对于民粹主义与新右翼政党兴起的讨论,揭示出政党政治不仅反映社会裂痕,更构成对制度结构的挑战与修正机制。民粹政党的异质性、多样性与策略性,使其对欧盟治理既可能产生破坏性干扰,也可能在特定议题上重塑主流议程。例如在气候、移民、对华政策等议题上,民粹党团虽缺乏一致立场,却通过议题聚焦与联盟动员对政策方向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也提示我们,不应将政党仅视为规范载体,更应理解其作为“多重张力调节器”发挥的现实作用。

在欧盟持续面临地缘政治挑战、经济安全转型与社会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政党的作用日益突出。它们在制度内部调节机制与外部战略延展中兼具合法性动员、价值整合与功能调适的能力。学界应设立一个以政党为分析中心的研究议程,突破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范式,将政党视为连接制度、认同与政策的三重轴心。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解释欧盟当前的运行困境,也为理解其未来重塑路径提供更为系统与动态的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门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紫江特聘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